

目 录

- 高大羽三次入狱 武士英 (1)
我从事“二人台”艺术的回忆片断
..... 倪丑旦忆 赵欣业整理 (7)
临河县一完小史略
..... 王有福 郭兴和稿 杨海涛整理 (12)
解放前二完小概况 周汝治 张连武 (28)
回忆解放前临河县的卫生事业 (1927—1949)
..... 刘玉成 (39)
忆河套青年军的征集经过 刘培荣 (58)
解放前临河商会始末 王延英 (63)
回溯黄河水患 史明德 刘培荣 (76)
黄河水患亲历记
..... 郝维垣 苏维岳稿 赵欣业整理 (83)
临河戒烟所 王延英 (88)
世成西与绥远农业改进所简忆
..... 周汝治 张连武 (96)
回忆临、狼两县国民党县党部工作片断
..... 苏维岳 武全体 (109)

高大羽三次入狱

高大羽，又名高玉祥，一九一二年生于河北省行唐县七里峰村农民家庭，弟兄三人，他排行老大。

由于家计贫苦，他高小毕业便辍学务农。饱尝了地主、恶霸的压迫和剥削。

他二十四岁那年成亲。婚后不久，妻子患病，因家境贫寒，无钱医治，病卧二年，被病魔夺去了生命。大羽悲痛难忍，遂决心脱离困境，寻找光明。经与堂兄高瑞祥商量，并得到其支持，于一九三六年背井离乡，来到临河。

大羽生性刚直，为人豪爽，来临河后，怕加重堂兄的负担，只身一人住在瑞祥的南凉房，以压挂面、打零工、收羊肠子为生。

一天，瑞祥小声地对大羽说：“兄弟，听说临河有共产党，是专为穷人的党。”他听了很高兴。“这个党在什么地方？”瑞祥告诉他，“临河南台子有个赵子丰（当时是地下党员、后叛变）也是咱河北人，经常替穷人写呈子，他可能知道共产党在哪儿。”他听了后，就到南台子找

赵子丰认老乡。赵听他是河北人，出身又很苦，劝他鼓起勇气，指出光明就在前头。时间长了，他吐露出想找共产党的愿望。赵子丰把这一情况向中共临河城内知识分子支部书记刘进仁同志作了汇报。刘进仁同志找高大羽谈了两次话，认为他出身贫苦，有爱国抗日的思想，还有点文化，于一九三八年冬，在临河南台子经赵子丰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支部认为，高大羽虽然住在城内，但没有公开的职业，所以决定高大羽算南台子党支部的一名党员，不和城内支部发生关系。

在党的教育下，大羽进步很快，为党的工作日夜奔波。一九三九年五月，傅作义在五原新公中召开了一次抗建讨论会，高大羽由临河动委会主任刘进仁（地下党负责人）带领参加了这个讨论会。在讨论中，他坚持党的方针、政策，大胆发表意见，主张积极抗日，和投日派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说：“大敌当前，民族矛盾是第一矛盾，因而国共两党必须合作，共同抗日，一致对外，只有如此才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他的发言，得到了傅作义的表扬。会后，临河县长王一然（以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提拔大羽为临河一区干事，后又被调到永昌乡担任动委会主任干事。

工作中大羽以身作则，激情满怀，时时想抗日，处处讲抗日，人民群众伸出大拇指称赞他是好样的，从而也引起了亲日派、地主官僚们的不满，对大羽的行动进行了监视，同时上报了省动委会。

一九三九年春节之前，省动委员会书记长于纯斋，特意来临河，盘查高大羽的行动。事后不久，派特务把大羽和共产党员刘光明同志秘密扣捕，交陕坝特务机关审讯。于亲自派特务，逼他俩承认是共产党员，并说，只要能供出党在临河的领导人（指刘进仁同志）不但免他俩的罪，而且还给高官做。大羽对党忠贞既不屈服，也不为利诱，胸有成竹地回答：“我刚来到临河不到一年，连个住处都没有，怎么能入党呢？至于，谁是共产党的领导，姓牛的还是姓刘的我一概不知道。”特务把审讯结果向于纯斋汇报。由于一无口供，二无证据，于纯斋也只好下令释放，官复原职。但他们并没有取消对大羽的暗中监视。

一九四一年春，高大羽按党的指示，在罗圈湾^{晋北}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同时打击了两户破坏抗日、欺压老百姓的大地主，替穷人出气伸冤。附近的群众，对大羽的行动十分支持，都夸奖他是打富济贫的好汉子。不料，风声过大，被地主直

接告到省动委会，说高大羽是共产党员，拉拢群众，搞乱了社会治安，要求省里派人捉拿。于纯斋闻讯后，立即派出密探，来到罗圈湾和地主勾结在一起，将大羽同志第二次逮捕入狱。

是年二月初，陕坝监狱对大羽软硬兼施，逼他承认是共产党员。大羽宁死不屈、坚贞无二。敌人脸一翻 将枪口对准大羽的太阳穴，问：

“你既不是共产党员，怎么能知道共产党员抗日路线？”大羽毫不含糊地回答：“抗日路线是傅长官（指傅作义）在五原会上讲的，如果要错，是他错了，我是听‘傅长官’讲的。”紧接着大羽反问：“不是讲国共合作抗日吗，怎么又错了？”逼得敌人无言以对，唯有暴跳如雷，怒不可遏。敌人把大羽整整拷打审问了三个月，大羽志坚如钢，口供不变，敌人抓不住把柄，只好又将大羽释放。省动委会以大羽是所谓的“二茬犯人”撤销了动委会主任干事的职务。他便回到临河东门外代兴堂庙小学以教书作掩护，继续作党的工作。

这时，中共临河地下县委已遭敌人破坏了，而五原、晏江、安北还有党组织的活动。一九四二年冬，大羽为了寻找党的组织，他到了晏江。通过关系，在县政府找了个科员职务，同时暗中和晏江、五原的党组织接通了关系。时间不久，

晏江设治局长家业骏向陕坝特务机关报告，说高大羽有“共党”的活动，并说：“高大羽在临河、五原、晏江等地拉了很多人，建议火速派兵围捕。”敌人听到在三个县拉了很多人，胆颤心惊，吓得要命，马上派特务头子祁觉明带了一群匪兵，去到晏江县，当时大羽回到了罗圈湾，敌人追到罗圈湾把大羽扣捕了，又带回晏江，企图逮捕共产党在晏江的领导人，但在大羽口里丝毫没有捞到油水，只好将大羽一人第三次关押到陕坝监狱里。于纯斋亲自到监狱里审问高大羽，他得意忘形地问：“这次没有什么说的了吧？是共产党也没有什么，只要承认，洗手不干就行了吗！”大羽知道敌人又在耍花招，这次敌人是不会放过自己的。暗想，反正我是跑不了啦，欲试探他们究竟抓住了什么把柄。压低声音说：“书记长太辛苦了，不知我怎么惹下了你、三番五次抓我，要我承认是共产党员，你们有何证据？”一个“证据”说火了敌人，“你入‘共党’还要我作证吗？”“真是胆大包天，给我打……，”敌人一次次审问失败了，高大羽被烙铁烫、木杠压、竹签钉、辣水灌、铁签烧……，折磨得死去活来，遍体鳞伤。

一九四三年农历正月初三晚，敌人又审讯拷打他，四十多天来，他已被摧残得体无完肤，奄

奄一息。但大羽同志，对党忠贞不二，横下一条心，丝毫没有吐露党的机密。凶残的敌人，眼看捞不到什么结果，竟把大羽活活打死在刑讯室，时年只有三十岁。高大羽钢铁般的革命意志，顽强的斗争精神，深深感动了狱中难友和周围群众。他牺牲后，难友们冒着生命危险，给大羽的堂兄高瑞祥捎了话，将尸体运回临河，埋葬在临河旧城西门外。

一九五四年五月三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给高大羽家属颁发了《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光荣纪念证》临河县政府民政局在他的墓地立了纪念碑，每年清明节，还组织学生、干部进行扫墓纪念，开展革命传统教育。

武世英整理

我从事“二人台”

艺术的回忆片断

倪丑旦忆 赵欣业整理

临河地区说起我倪丑旦，都知道是演“二人台”用鼻子吹枚（笛）的，可是我从艺“二人台”的经过知道的人却不多。河套人谁不能抖几句“二人台”呢，舞台上锣鼓一打，丝弦一拉。女的红袄绿裤一把扇，男的紧身短打扮。敲上梆子，哨上枚又歌又舞，既漂亮又朴素，引的青年人羡慕不已，可是旧社会“二人台”艺人的苦和泪是说不完，道不尽的。

我祖居陕西府谷。解放前陕北地方世代贫困，百姓衣食无着，温饱靠天。常年的生活，糠菜都无保障，民不聊生。荒年歉月，百姓更是无法生活只好背井离乡，乞讨为生。逃荒路上，抛儿弃女，流离失所。旧社会，穷人遇难真是叫天天不语，吼地地不灵，求神问卜也不济事。我自幼家贫，衣食不周，饱尝了人间的辛酸。

那时候，但凡有谋生之道，只要不损害人，

我都愿意干。所以在一九二四年我八岁时，在老家皇甫温家峁村跟叔叔学吹“枚”、拉胡琴、唱小曲。不久，便和邻近年纪相仿的艺人组成一支相依为命的“玩艺儿班子”。那年景，人们看不起“二人台”艺人，叫“要玩艺儿”的，和讨吃的差不多。我们为了活命，到处赶“庙会”，办“社火”，献唱卖艺。“二人台”艺术成了我唯一赖以度命的技能。因此我也着意于求艺，勤恳练习，努力提高技艺。我用鼻子吹枚就是这一时期：

有一年在故里街上，见一算命先生，双目失明，他一手扶杖（马杆），一手持笛，在鼻孔上吹，走街串巷，招徕生意。我出于好奇，将他请在我家住宿。在我的请求下，他给我教会了用鼻孔吹“枚”。我又将这一技巧运用到“二人台”艺术表演中，立时得到群众欢迎，伙伴们赞赏，为“二人台”吹奏乐添了新花样。这期间我的表演技艺有了长足的长进。

我十七岁以后开始躲兵（逃避国民党抓壮丁，俗称躲兵）离家出走，东躲西藏，直到二十八岁，先后六次奔波往返于府谷到后套的跋涉之中。其间，食宿无着，奔波之苦可想而知。途中食宿，全凭唱“二人台”曲子和吹“枚”来换取。先后曾经在伊盟、桃力庙，黄后河、脑高岱

等地求宿演出。当时我每到一处，逢师必访，遇众则邀，或吹笛，或打“坐腔”（清唱），籍以提高技艺。

曾记得，十七岁那年正是一九三三年，在后套揽工，期满后结伙回府谷老家。我们取道沙漠，径直南归。一天夜宿中官地三道里，我们为答谢房东的热情招待，演奏吹笛。谁知却触犯了当地的“乡规”，说我们冲走了“神魂”，要我们树碑招魂，才饶恕我们。我等无奈，只好由响导求释，经过苦求才答应让我们给乡绅下跪、叩头，点烟赔情。我们因人地两生，只好依从。赔情不算，还罚我们大饼四十个，才算放行。

是日又路宿一家，房东乃是蒙族老乡。我见其壁上挂三弦，他见我携带笛子，知道有共同爱好，所以我们求宿很受欢迎，并受到款待。当夜，我们与蒙族艺人，真是异曲同工，欢聚一堂。此两处求宿，穷富不同，待人各异，泾渭分明。我们在旧社会行艺，和讨吃一样，真是吃尽了人间的苦哇！

一九四四年，家中父老兄弟，姊妹都到河套定居了。我也迁居河套适年二十九岁，技艺已经定型。平时给地主揽工干活，以苦为生，于农闲时，就与当地爱好者组成“玩艺儿”班子。当地逢年过节，或冬闲，受乡保及户家邀请，什么搞

“社火”（点灯灯）、作寿、办生日嫁娶喜事等等都请“玩艺儿”班子表演助兴。由于时尚如此，渐成风习。毗邻同好，不约而同组成一班或两班，不论时间、不讲条件，有求必应，四处献艺。这期间的同行中有：王红眼、卞满家喜、刘毛匠、刘二罗、关三拉（关全喜）、霍存柱、边英生、胡存旺、陈家保（李子义）、贾三秃、陈三如等若干人。

直到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后，人民重见天日，才结束了旧艺人，信天由命，到处求乞的流浪生活。得到了政府的重视和支持。“二人台”艺术获得了新生，党肯定了我们的艺术工作，誉“玩艺儿”班子为文娱宣传工作者。艺人生活有了保障，演出也给予赞助。

一九五〇年在临河县四区所在地八岱，由赵永年、孙玉斌带领下，招回我原班人马，共约十多人。同时招收八、九十名青年人，进行为期四个月的培训。训练结束后，黄羊成立歌舞团，我为团长。组成了民间文艺宣传队名为“黄羊乡业余文艺宣传队”，事后就在黄羊乡村村社社，编唱新形势下的新人、新事、新面貌。也曾出外搞宣传，曾到过：临河、伊盟的巴拉亥、海渤海、乌达、五原等地，很受群众欢迎。

一九五三年受临河县委委托我和同伴王维柱、

王富生、巴根海、刘二罗、刘毛匠、霍存柱、关三拉（关全喜）等七八人去呼市，参加全区举行的文艺汇演，历时七天。演出期间我以鼻孔吹笛的特长进行了表演。大会给我们每人一枚纪念章。

以后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了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一员，唱“二人台”也有了政治方向。

由于翻身解放我才有机会在三十多岁结婚，娶妻生子，现在我儿孙满堂，真得托共产党的福。旧社会“打玩艺儿”的谁给老婆。

解放后我利用农闲时间演出“二人台”先后二十多年，直到一九六五年我最后一次演出（在五原）。自此以后再也没公演过，近年来，虽然年岁大了，但是一想老艺人年寿都大了，所以一有当年同伴来访，偶尔也演奏一次。乐声招来年青人，倒也红火。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政策逐步落实，农村经济好转，人们对文娱生活的要求高了。我虽年近七十，但在艺术上，仍壮心不已，老当益壮。但有求访者，来者不拒，吹打起来，仍不知疲劳。

以上是我从艺活动的几个片断，其中不难看出新旧社会两重天，我在艺海，实为一粟，忆旧从艺，供同好回忆过去，供青年认识历史，不当之处，请指正。

临河县一完小史略

郭兴和 王有福供稿 楊海涛整理

编者按语：临河市一完小校史的撰写工作，多年来受到多方重视和支持，自一九六六年以來曾先后由孙文远同志主持写成初稿约六万余字。后已故政协委员王明先生再撰一稿约二万余言，嗣后又有现任一完小校长和郭兴和老师重修。

今有教育局志办杨海涛先生综理前稿，撰成史略，发表如次。

谨此一并致谢！

临河县第一完全小学在我县教坛，历史比较悠久，其革命斗争史实既写下了炳耀篇章，孕育了出类拔萃的人才，分布在国内各条战线，为祖国建设增添了异彩。她是一所小学，然论其内蕴外彰确有令人难以遗忘的价值，爰叙其要略于后：

一、沿革

临河县第一小学始建于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日，迄今已有五十八年历史。初原是党为了河套革命斗争的需要创立的，原名“临河县两级小学”。

校”，一九四二年冬实行新县制改称“永济镇中心学校”，解放后又改称“临河第一完小”“解放镇完全小学”，一九五六年转化为“解放镇中心学校”“城关完小”“县直属完小”目前校名定为“临河市第一小学”。

早在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白色恐怖笼罩了省会归绥（今之呼和浩特）当时刚入党在归绥中学求学青年刘进仁，被派回临河工作，临河中共地下党支部决定，以创办学校为掩护，以便开展地下工作。经县教育局党员李春秀之介，拉设治局长孙国栋委任刘进仁为劝学督导员，筹备建校。复经李春秀和教育局长王丕卿的多方努力，在李春秀的参与下盖起了两间教室，十二间房子，收纳乡内东关小学生四十多名，刘进仁为校长，延聘秀才赵兴安，新学王汝贤当教员于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日正式开学，命名为“临河县两级小学校”。

于时学校经费奇缺，地下党支部决定由李春秀下乡劝募。取得教育局的派令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募得一部分捐款。扩充了校舍，增加了设备，实行了男女分校。并由李春秀、刘进仁分头下乡劝学。争取原天主教普爱学校学生陈良璧、訾秉杰等十余人转入完小。一九二八年秋开学

时，学生人数已达一百三十多名，分四个年级六个班，经地下党的活动，又聘请高立亭、崔书明、刘向日等人为教员，学校计有校长一人，教员六人，会计员一人，工友一人共九名。

该校自建校之日起至一九四〇年初，十三年来有着光荣的斗争历史，向广大学生播下了革命的火种，培养了一批为革命献身的优秀儿女，为临河教育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一九四〇年日寇铁蹄入侵河套，时仅半月，所到之处，生民涂炭，惨不忍睹，完小也难免其洗劫，校舍即沦为一片废墟。一九四〇年二月临河当局派郝维垣着手复校，北迁至县教育局旧址（即现在校址）因陋就简，利用小教室四间、自垒泥台。实行单复式二部轮上勉强开学。由于人心惶恐，学生亦只有四、五十人而已。

一九四五年春汛大渠决口，临河县城一片汪洋沦为泽国，完小首当其冲，校舍全被冲倒，无法开学，经教育局与私立万字会四箴小学协商，借校合并上课，秋季高年级迁在魏羊庙上课。同时进行建校，一九四六年秋校舍全部落成，气象一新。

一九五〇年二月十六日绥西生产建政工作团进入临河，党派团干李宝昌深入该校，进行具体帮助，校容校貌获得了新生。一九五一年废保建

政改称“临河县第一完全小学”学生达三百八十余人，分十二个班教师十九人。

一九六〇年跟着临河人口的剧增和建设的飞速发展的需要，原教室已不足供求，曾在今二七九医院地址，建一分校。一九六二年旧校宿舍改成教室，分校撤销，合归原校，校名又改称为“县直属完小”。

为减轻女教师后顾之忧，安定教师正常秩序。从一九七三年开始办起托儿所。教师幼儿入托，只收半费。

解放以来，党对教育事业十分重视，教育投资年年增加。

该校人员办学踏实认真，从纵横深广进军，发展挺快。一九七七年秋县教育局确定为重点小学。

一九八二年秋，上级拨款改建两层办公楼，面积为九百六十四平方米。并增设了图书室、科技活动室。一九八三年翻新砖木结构教室四座；一九八四年自筹经费一万四千余元修建两座壮观校门及小卖部一处。

二、师生发展情况

一九二七年创办时接收东关小学学生四十多名；

一九二八年秋季开学设六个年级六个班，学

生一百三十多名；

一九四〇年因日寇入侵学生仅剩四、五十人；

一九五一年废保建政后教师十九名，六个年级双班学生约三百八十余名；

一九五三年土改后，劳动人民得解放，贫农子女大批涌进了学校，分设十个班，拥有学生六百余人；

一九六五年设教改班一至五年级双班，非教改班一至六年级双班，共学生九百五十人；教师三十七人；

一九七三年全校二十八个班学生一千三百一十六人，教职员四十八名；

一九七六年发展六个初中班，学生三百零六人；中小学生共一千六百人；至一九七七年教师增至八十名；

一九七八年五中接收了完小初中部学生二百一十五名，教师十人，办理四年之久的戴帽子中学至此结束；

一九八二年起一至六年级各四个班，三个幼儿班，共二十七个班；

一九八四年在校生为一千九百四十名，其中校友子女七百五十四名。

三、教学管理与教学活动